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在班雅明與德勒茲之間思考翻譯－以清末民初林紓及薛紹徽的文學翻譯活動為引子

Walter Benjamin and Gilles Deleuze on Translation-The Case of Lin Shu and Xue Shaohui

doi:10.6711/REAL.201412_(25).0001

英美文學評論, (25), 2014

作者/Author：邱漢平(Han-Ping Chiu)

頁數/Page：1-2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11/REAL.201412_\(25\).0001](http://dx.doi.org/10.6711/REAL.201412_(25).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在班雅明與德勒茲之間思考翻譯

以清末民初林紓及薛紹徽的文學翻譯活動為引子

邱漢平

摘 要

在清末民初大規模翻譯西方文學運動裏，林紓及薛紹徽兩人都不諳外文，分別由通外文者逐句說明原文旨意，再由他們分別修改、潤飾、記錄下來。本論文以林紓及薛紹徽等不同於一般定義下的翻譯活動為引子，導出班雅明與德勒茲與瓜達里在翻譯方面的不同論點，並藉著他們論點之歧異處，探究翻譯史上長期以來有關直譯與意譯之爭，以及翻譯用於文學／文化研究，乃至生命科技研究之可能途徑。

本論文選擇以林紓及薛紹徽參與譯事為佐證或引子，主要原因在於他們的翻譯活動挑戰班雅明有關翻譯的概念。若按班雅明在〈譯者之天職〉裏所陳述的觀點，其實口述者已完成翻譯的程序，相較於譯者在原文與譯文之間突然領悟如何克服語言間的異質性，再將領悟轉為譯文，林紓與薛紹徽筆錄、整理、美化文字，可說絲毫沾不上翻譯的邊。其次，林紓為清末民初西方文學中譯運動裏造成巨大影響者，薛紹徽素有中國第一位女譯者之美譽，他們的譯事活動迫使翻譯的視野有必要重整。

改從德勒茲與瓜達里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林紓與口譯者之間的合作關係，或薛紹徽與陳壽彭夫婦的閨房譯述，都構成所謂的塊莖或朋友關係。因為任何兩者都可能構成塊莖，而打破屬於樹根類親屬關係隱含的疆域，連帶在跨越疆域中把翻譯帶進轉譯或轉碼。平輩的朋友關係宛如內在於知識的一連串對等連接詞「和」，在競爭與協助的一連串環節中，影響甚至改變論述的內容。

關鍵詞：翻譯、塊莖、林紓、薛紹徽、班雅明、德勒茲

*邱漢平，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

2014年7月20日收到稿件／2014年11月2日接受刊登
《英美文學評論》25(2014): 1-27 | ©中華民國英美文學會

Walter Benjamin and Gilles Deleuze on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Lin Shu and Xueh Shaohui

Hanping Chiu[§]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Walter Benjamin with the visions of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on transformation, using as a catalyst the cases of Lin Shu and Xueh Shaohui, the two Chinese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project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of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choice of Lin and Xueh as the starting basis is made mainly on their joint translation ventures that trigger the rethinking of what translation is all about. Lin and Xueh, in their respective endeavors, put down into Chinese what their co-workers dictated orally from interpreting the original texts, instead of alone doing the translation. Either Lin or Xueh, in recording, rephrasing or embellishing the language, does not count as a translator, according to Benjamin 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for the people working with them have single-handedly accomplished the task of translation.

In the views of Deleuze and Guattari, the joint translation ventures may forge a relationship of what they call rhizome or friendship. On the thread of this thought, alliance is valued above filiation, bringing along deterritorialization in its wake, as any two things may form a rhizome. Emerging out of a jumping from one territory to another, or from one race to another, is transduction or transcoding, which differs from translation in not being carried on by a translator. Friendship is explored to see how it may affect the putting into words what one party hea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rhizome, Lin Shu, Xueh Shaohui, Benjamin, Deleuze

[§] Hanping Chiu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amkang University.

中國傳統裏最重要的兩次大規模翻譯活動，一次是南北朝與隋唐時期的佛經漢譯，一次是清末民初的西洋典籍翻譯。在最近一波中譯運動裏，西方文學的翻譯，尤其是英美文學，數量相當龐大，單是林紓(1852-1924)就翻譯一百八十多種外國小說為中文，¹ 包括美國小說家斯陀(Harriet Beecher Stowe)的《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及英國小說家狄福(Daniel Defoe)的《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魯迅(本名周樹人，1881-1936)與其弟周作人，以漢語古義直譯外國文學的方式合譯《域外小說集》二冊。在這之前，魯迅也曾在留日期間以當時中國流行的意譯方式，先後從日文譯本，轉譯法國作家凡爾納(Jules Verne)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和《地底旅行》(*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有中國第一位女譯者之稱的薛紹徽(1866-1911)，與其夫婿陳壽彭(1855-?)合作，翻譯凡爾納的英譯本小說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為中文之《八十日環遊記》。這些人中，林紓及薛紹徽皆不通外文，靠著別人告知原文意義後，再以流暢典雅的中文寫下譯文，對待原文及原典頗多更動修改之處。魯迅兄弟通曉英、日、德等國語言，雖然在留日期間曾意譯凡爾納的兩本科幻小說，但在一九〇八年前後，開始採用直譯方式翻譯外國小說。從清末民初意譯風氣的盛行，到五四運動後直譯受到肯定，意譯開始遭到貶抑。王宏志在〈民元前魯迅的翻譯活動：兼論晚清的意譯風尚〉裏說：「意譯之所以在晚清成為一種翻譯風尚，實在有客觀環境上的需要，也就是說，如果翻譯作品要得到讀者的接受或支持，意譯是重要的手段」(192)。魯迅兄弟直譯的《域外小說集》兩冊，銷路慘澹，當時風尚之所向，由此可見一斑。這段期間翻譯概念在中國境內的激盪流變，不論是直譯與意譯之變化起伏，或林紓及薛紹徽在翻譯過程所扮演的角色，都讓人覺得有必要重新省思翻譯。

翻譯到底該採直譯或意譯，一直是翻譯史與翻譯研究裏的熱門議題。在十六世紀引爆歐洲宗教改革的路德(Martin Luther)，鑒於當時的德文詞彙貧乏，決定在翻譯聖經時採直譯方式，日後對豐富、活絡德國語言貢獻很大。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 根據劉雪真在博士論文《依違於古今中外之間：林紓譯／著言情小說的研究》裏的論點，林紓和他人總共合作翻譯了二百種左右的小說(44)。目前學界大致認為他與人合譯的小說有一百八十多種，主要是根據林薇整理出的一百八十九種（參見林薇 86-95）。但根據樽本照雄的研究，林譯小說達二百一十三種（參見樽本照雄 4）。

在他研究翻譯的文章〈譯者之天職〉(“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裏，提到路德、佛斯(Johann Voss)、施列格(Friedrich Schlegel)、喬治(Stefan George)和賀德霖(Friedrich Hölderlin)等譯者，讚揚他們的直譯手法「擴展德語的疆域」(261)。在中國南北朝與隋唐時期的佛經漢譯，鳩摩羅什傳譯之時，會刪減論書(經律論之論類著作)的原典，以求譯文更為流利通達。玄奘在尋求全本翻譯之餘，強調忠於原典，提出「五種不翻」的翻譯觀，其中最重要的如「多含故，不翻」及「此無故，不翻」，透過音譯保留原文豐富及獨特的意含。在〈翻譯文學與佛典〉裏，梁啟超提到漢語語彙因此增加「三萬五千餘言」，並說：「此語者非他，實漢晉迄唐八百年間，諸師所創造，加入吾國語系統中而變為新成分者也」。² 英美兩國的翻譯傳統，強調文字流暢典雅的意譯，在某些時期或可稱為主流，但主張忠於原文的呼聲始終存在。號稱北美印製的第一本英文書籍，《信實譯為英文韻體的全本聖歌》(*The Whole Booke of Psalmes Faithfu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Metre*, 1640)，由一羣清教徒教士以直譯方式自希伯來文版本翻譯過來。十九世紀時，泰勒(Bayard Taylor)也以直譯手法翻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浮士德》(*Faust*)，遵循歌德的信念：最頂級翻譯是譯者緊盯著原文(Lefevere 76)。意象派詩人龐德(Ezra Pound)重實驗性翻譯，表面上雖為馴化，實際卻是突顯外語特殊性的異化。到二十世紀中葉，美國在詩與散文的翻譯，走上徹底的馴化，外語文本放在當代美國主流文化價值的框架裏翻譯(Venuti 310)。在英國，從文藝復興到十八世紀，翻譯大致走在馴化之路上。英國十八世紀兩位最偉大的作家德萊登(John Dryden)與波普(Alexander Pope)，都主持過荷馬史詩的翻譯工作，也都曾為文提出翻譯論點，成為主張意譯的重要源頭。但英國在十八世紀末出現一篇重要的翻譯理論文章，提特勒(Alexander Tytler)的〈論翻譯原則〉(“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791)，批判德萊登的意譯手法(paraphrase)及因此導致的鬆散翻譯，主張譯文必須忠實呈現原文的全部意義、風格與樣貌。馴化翻譯在十九世紀也遭到批判，卡萊爾(Thomas Carlyle)即認為譯者的職責是「準確呈現原文的風貌」(Ashton 84)，但十九世紀後半葉仍循著原先馴化方式翻譯。

檢視上述幾個國家的直譯與意譯傳統之演變，再回頭看看林紓及薛紹徽在當時

2. 〈翻譯文學與佛典〉收錄在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第九篇。書中頁碼係按篇章各自從頭編起，而非全書統一編碼。上述引文出現在〈翻譯文學與佛典〉篇 27。

他們所處環境下參與的翻譯活動，或許不難理解他們何以偏向意譯而不採直譯。不同於魯迅兄弟能直接閱讀原文，且對翻譯外國文學懷抱著改造國族心靈的偉大理想，林紓及薛紹徽對原文的理解僅限於別人告知的語意，好像也很難有意譯之外的選擇。薛紹徽從事翻譯的動機，除增加西學知識外，就是幫助丈夫籌湊返鄉應鄉試的川資³，選擇較受讀者歡迎的流暢文字非常正常。林紓在與王壽昌合作，翻譯法國小說家小仲馬作品為《巴黎茶花女遺事》，在一八九九年出版後轟動異常。從林紓獲得的熱烈迴響及之後優渥的譯稿報酬，對他本人來說，改編原文章節，另以典雅中文呈現，顯然是適切作法。儘管如此，林紓及薛紹徽所參與的翻譯工作，並非毫無價值。相反地，從他們在閱讀大眾所激起的熱烈回應，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所產生的作用，乃至在學術界的研究興趣，錢鍾書、李歐梵、周蕾等著名學者都有長篇論文或專書研究林紓，以此為博碩士論文題材的也很多。康普敦(Robert William Compton)完成於一九七一年的史丹佛大學博士論文《論林紓的翻譯，1852-1924》(“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s of Lin Shu, 1852-1924”)，對林紓的譯著分析得極為細膩。研究薛紹徽的學者雖然較少，但從她的著作收錄在清代詩文選及哈佛大學出版的選集，她在學術界的份量顯然已在醞釀增長中。

本論文以林紓及薛紹徽等不同於一般定義下的翻譯活動為引子，導出班雅明、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里(Felix Guattari)在翻譯方面的不同論點，並藉著他們論點之歧異處，探究翻譯史上長期以來有關直譯與意譯之爭，以及翻譯用於文學／文化研究，乃至生命科技研究之可能途徑。

本論文選擇以林紓及薛紹徽參與譯事為佐證或引子，主要原因在於他們的翻譯活動挑戰班雅明有關翻譯的概念。若按班雅明在〈譯者之天職〉裏的觀點，其實口述者已完成翻譯的程序，相較於譯者在原文與譯文之間突然領悟如何克服語言間的異質性(foreignness)，再將領悟(enlightenment)轉為譯文，林紓與薛紹徽筆錄、整理、美化文字，可說絲毫沾不上翻譯的邊。其次，林紓為清末民初西方文學中譯運動裏造成巨大影響者，薛紹徽夙有中國第一位女譯者之美譽，他們的譯事活動迫使翻譯的視野有必要重整。如果從德勒茲與瓜達里的觀點來看，林紓與口譯者之間的合作

3. 據陳壽彭在〈亡妻薛恭人傳略〉所言，「壬寅余辭館復居滬譯書恭人賣畫謀歸閩貲斧入秋恭人佐余合譯成格致軌十卷八十日環遊記四卷乃歸應鄉試」(76；原作未加標點)。

者關係，薛紹徽與陳壽彭夫婦的閨房譯述之樂，把朋友關係帶進翻譯裏，黃蜂與蘭花(wasp and orchid)的巧妙合作也帶進其中。此外，聆聽與筆錄之間的轉換，亦即聆聽所得的意念及筆錄時用以表達的語彙，與德勒茲與瓜達里在《何謂哲學？》(*What Is Philosophy?*)裏所提創作意念及賴以表達的材料(163-64)，有若干吻合之處。「作家的特殊材料是文字跟語法，所創造的語法無法抗拒地上升進入他的作品，融入感覺(sensation)」(167)。由林紓及薛紹徽的譯事活動引發的翻譯概念再思考，可望產生連番效應。

一、直譯、意譯或創作

第一部中譯的西方科幻小說《八十日環遊記》，由陳壽彭口述，薛紹徽筆記。根據陳鏘、陳瑩、陳荭兄妹合撰的〈先妣薛恭人年譜〉，主修船炮工程，通曉英文文的晚清才子陳壽彭，白天翻譯《江海圖誌》，晚上與妻薛紹徽「談外國列女事略並《八十日環遊記》」，其妻則「以筆記之」(83)。陳壽彭為妻口述《八十日環遊記》，是因為妻子對「吳越舟車」、「汽輪電燈」「駭然欲窺其奧」(施蟄存 5)，因而揀選這本他認為較為淺近的小說。陳壽彭畢業於福建船政學堂，少年就因才識在文壇上獨樹一幟，後來曾遊學日本、歐洲，並在寧波、南京、上海等地講學辦報(陳宏 62)。薛紹徽與夫同為福建人，出身書香門第，中文舊學根柢深厚，但不諳外語。有關她筆錄、修飾、整理過的丈夫口述資料，郭延禮稱讚譯本「幾乎沒有刪節和增添，幾乎無懈可擊」(10)。卓加真則指薛譯本並非如郭延禮所言之美好，其實「不是一篇忠於原文的作品」(2)。卓加真以《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收錄之《八十日環遊記》版本，比對顏湘如所譯同一本書之目錄，認為薛「完全沒有理會原文的文字架構」，只是「寫上譯者自己對該篇的簡短摘要」(11)。由於薛譯本所根據的是陶爾(M. Towel)和安佛思(N. D. Anvers)翻譯的一九〇六年英文版，該版本已經佚失，兩者之間到底有多少出入，已無法嚴謹考察。不過，如與牛津世界經典系列(Oxford World's Classics)裏布丘(William Butcher)的英譯本比對，目錄部份確實有多處出入，包括修繕原文題目，針對內容給予新標題。

對照林紓與其合作的口譯者所譯出的作品，薛譯本與原文的出入不算特別明

顯。林紓的譯作，論者批評的重點，頗多集中於他的翻譯先經口譯者譯出，再由他寫定，錯誤、增刪之處太多。梁啟超就認為，這種「不通西洋語言文學之人」，能力有限，對西學的譯述是「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2004:218)。劉半農指出，「把譯本和原本對照，刪的刪，改的改，精神全無，面目全非」(57)。清末民初的翻譯風尚，還是意譯當道，譯者在意的是情節內容符合中國的民風俗尚，文字方面則力求譯文的流暢優美。如有違背之處，即使更改原文、扭曲原意，也照做不誤。潘少瑜在博士論文《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鵑為中心》裏，參考陳平原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的話說：「在意譯風尚的影響下，許多譯者任意將書中的人名、地名，以及語法修辭都加以中國化，有的改變小說體例、重擬回目，刪去『無關緊要』的閒文和『不合國情』的情節，有的則增加原作之中沒有的情節和議論，成為創造性的翻譯」(潘少瑜 29；陳平原 625)。劉雪真在博士論文《依違於古今中外之間：林紓譯／著言情小說的研究》提到清末的「豪傑譯」，稱林紓的翻譯雖然還沒到「豪傑譯」之大膽隨意程度，但晚清意譯的多種花樣，如「闡釋、改寫、增譯、縮譯、轉譯、重整，甚至再創」，林紓的翻譯「兼採多種方式融為一爐」(50)。

從林紓與薛紹徽採行意譯導致種種更動原文、不遵照原意之作法，以及先經由口譯者譯出再由他或她寫定，難免讓人質疑他們這麼做還能算翻譯嗎？如果從班雅明的角度來看，翻譯與創作是有明確區分的。在〈譯者之天職〉裏，班雅明指出，翻譯與創作之區別，為一在語言森林的邊緣，一在語言森林中央；「有別於文學作品，翻譯不在語言森林的中央，而是在外面面向高聳的樹林，對著森林呼喊而沒進去，瞄準的那個單一地點，其回聲能以它自己的語言傳回外國語言的迴響」(258-59)。在語言森林的邊緣面向森林，其不同於身處語言森林中央之處，就在於必須觀測從何處傳回之回聲能有外國語言的迴響，無法像在森林中央可以不理會這一切而顯得逍遙自在。上面這段引言，班雅明稍後在文章中以圓周跟切線相切來表達：「正如切線輕觸圓周且僅觸及一點——以此碰觸，而非這一點，立下其繼續在直線路徑上無限延伸的法則——譯文輕碰原文，且僅觸及無限小的一點意義，接著所走的路線，就根據信實法則，任憑語言自由變動」(261)。切線輕觸圓周且僅及一點，有如站在語言森林的邊緣面向森林。直接放在翻譯的情境，譯文必須碰觸原文，儘管觸及的意

義僅是一丁點，表達的方式也可以有無窮的彈性，但必須如此才稱得上翻譯。回到前一個引文提到的語言森林中央，由於不在邊緣，自然沒有跟外界碰觸的機會。以此來看創作，文意可以不考慮與其它文本的接軌，因而可以逍遙自在，不受任何束縛。林紓與薛紹徽種種更動原文、不遵照原意之作法，如果從班雅明的角度來看，其實已偏離翻譯而接近創作了。

至於先經由口譯者譯出再由他或她以流暢筆調寫下來，單就筆錄者的角度來說，是否還能算翻譯？如果從前述在語言森林中央與在語言森林邊緣來看，口譯者是身處森林邊緣面向森林的人，必須處理不同語言間的轉換問題，而筆錄者自始至終都留在語言森林中央，從未脫離森林而站到邊緣，因此並沒有面對語言轉換問題。即使口譯者之語言較為粗疏散漫，仍非不同語言間難以一勞永逸克服的「異質性」(foreignness)。在〈譯者之天職〉裏，班雅明提出所有翻譯都只是臨時處理語言間的異質性，「立即且徹底的處理此異質性，而非暫時、臨時的解決，仍非人類能力可及；無論如何，它仍無法直接處理」(257)。班雅明所提翻譯必須不斷克服語言異質性的概念，有效分隔口譯者與筆錄者兼潤飾者，因為後者所面臨的已非原文某些面向無法在譯文呈現的問題，而是同一語言內如何使文字流暢典雅的修辭問題。林紓或薛紹徽，由於不懂原文，自然沒有處理語言異質性的觀念。關於這一點，班雅明在圓周跟直線相切的段落，有一些值得進一步深思推敲之處。圓周跟直線相切，是單子(monad)概念常見的模式，⁴ 班雅明在此段落表面上似乎沒說甚麼，其實在「以此碰觸」，「立下其繼續在直線路徑上無限延伸的法則」(261)裏已明白提示，在原文與譯文接觸瞬間，領悟到「能以自己語言傳回外國語言迴響」(258-59)的那個單一地點，此一領悟則轉化為在信實法則下的語言自由變動，也就是在可譯範圍內的彈性調整。換句話說，同時懂得原文與譯文，才能獲得語言轉換的關鍵視野，因此才得以

4. 德勒茲在《皺褶》(*The Fold*)書中亦曾引用圓周與直線相切的單子模式，皺褶的概念也脫胎自單子。不過，即使班雅明與德勒茲同受單子概念的影響，兩人對許多議題之觀點並不必然就此相同。誠如德勒茲在《史賓諾莎：哲學裏的表現主義》(*Spinoza: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所說，與其說他是個萊布尼茲者，不如說他是個史賓諾莎者。更何況深刻影響德勒茲者，除這兩人外，至少還有休謨(David Hume)、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人。如果再加上與德勒茲合寫《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及《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的瓜達里，交互作用下，思考脈絡更為繁複多樣，與班雅明之論點更為遙遠。

拿捏信實原則的底線何在，語言可以自由變動到甚麼程度。原文的重要性，在〈譯者之天職〉開始不久處，班雅明即明確指出：「翻譯是一種形式(form)。要以形式理解它，就必須回到原文，因為統理翻譯的法則就在原文裏，含在可譯性議題裏」(254)。林紓或薛紹徽與口譯者合作的譯書工作，從以上所引班雅明的論點檢視，他們兩人所扮演的角色，很明顯不屬翻譯行爲。

相較於林紓與薛紹徽參與譯書的角色及他們對待譯文的尺度，魯迅及其弟周作人所堅持的直譯，有著極大的差異。先不說林紓與薛紹徽參與譯書的金錢誘因，魯迅兄弟可是本著「別求新聲於異邦」的想法，希望透過翻譯外國進步的文學思潮以促進中國民眾的覺醒。魯迅昆仲外語能力甚佳，魯迅能直接閱讀日、英、德等語言，也曾透過這些語言轉譯一些俄文及東歐語言的作品，希望把這些具抗拒壓迫思維的作品引介到中國。周作人晚年在一篇名為〈魯迅的編輯工作〉的文章裏談魯迅的直譯，強調直譯是忠實保存原文的內容、精神，而非保存原文的字句排列，刻意消除大眾對魯迅硬譯的印象，「他要直譯原文的意思，（是意思，不是原文的字句排列）是要保存本來的風味，同時也要在中文上講得通。他要國文說得通順，同時也要譯者的文章留些本來的風格，所以他總是就原來的文章潤色一些」(564-65)。儘管如此，魯迅譯作裏散見的硬譯文字，仍是許多人閱讀後的印象。王宏志在〈魯迅翻譯研究的理念思考〉裏說，「在翻譯的理論裏，『直譯』的其中一個解釋是要讓讀者走向原著，即是說，譯者盡量保持原著的內容和特點，不去爲了遷就讀者而作改動」(353)。錢理群談到周氏兄弟的直譯時說：「周氏兄弟在翻譯、介紹外國著作時，首先著眼於思維與語言，強調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及語言的改造，這是別具眼光的」(166)。彭明偉認爲，周氏兄弟以直譯外國文學代替意譯，是希望將其思想和形式完整引進中國，「他們寧可保留歐化的句法，即便譯文被人稱爲『詰屈聱牙』也不在意」，對於周氏兄弟，「翻譯外國文學不僅有助於外國新思維的引進，同時也有助於文字語言與表達形式的改革」(86)。

魯迅與其弟的直譯主張、作法及背後所抱持的理念，相較於當時大眾的閱讀品味及林紓、薛紹徽的翻譯方式，的確大相逕庭，甚至可說南轅北轍。如果從班雅明的角度來看，這樣才算是翻譯，也是翻譯該走的路。直譯顯然違背、挑戰讀者的閱讀習慣，不從讀者的角度設想。但班雅明在〈譯者之天職〉裏一開始即說，「在藝術

品或藝術形式的欣賞上，從接受者的角度思考，一向都不會有豐碩成果」(253)。同一段接著提到，「沒有一首詩是為讀者而寫，沒有一幅畫是為觀看者而畫，沒有一首交響樂是為聽眾而創作」(253)。不從接受者的角度思考或創作，顯然是為了藉此打破他們習慣的認知模式，讓他們在困頓中領悟到其它的組合可能。有關直譯的問題，也應該從這個角度探究。根據班雅明的說法，「照句法直譯，等於完全棄意義的再現於不顧，可能直接導致語意之不可解」。因此，「沒有一件直譯是為保存意義。意義的保存，在拙劣譯者恣意而為時，反而更能達成，卻不利於文學和語言」(260)。在內容（即意義）與形式（直譯）之間如堅持後者，可能像賀德霖翻譯古希臘劇作家莎弗克利斯(Sophocles)兩齣悲劇般導致語意全盤崩潰。但班雅明認為這麼做有絕對的必要，因為直譯可迫使讀者把眼光從熟悉的個別語言間的類似，轉向語言親屬關係裏像黏貼瓦罐碎片時注意彼此的互補(260)。在這裏，班雅明顯然要指出，直譯固然造成意義流失，卻使得其潛藏的語言親屬關係碎片（即純粹語言）得以顯現，讓自己語言的獨特性清楚展現。至於透過直譯拓展語言的疆域，增加外來語詞彙的數量，班雅明也作如是觀，彼此並無差別。最大的差異，在於班雅明提出語言親屬關係與純粹語言的觀念，以此詮釋直譯在翻譯、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意義。

從班雅明對直譯的讚許，對意譯的貶抑，回過頭來看林紓與薛紹徽兩人的譯事活動，以及他們在清末民初造成的巨大影響。正如早先所說，不懂外文使得他們無法直譯，這或許可說是一種先天的限制。如果再從班雅明對翻譯的定義，對翻譯與創作的區分，他們兩人所從事的都不能算是翻譯。胡適在〈論翻譯：與曾孟樸先生書〉曾說，中國「能讀西洋文學書已近六十年了，然名著譯出的至今仍不滿兩百種。其中絕大部份，不出於能直接讀西洋書之人，乃出於不通外國文的林琴南，真是絕可怪詫的事」(803)。林紓與薛紹徽都參與中國傳統裏最重要的兩次大規模翻譯活動之一，所譯出來的書籍對中國現代化造成無比深遠的影響，有興趣研究他們的學者可說車載斗量。如果這還不算翻譯，還以劣等翻譯加以貶斥排除，可能不少人會無法接受。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更加真切的問題，是根本質疑這些定義、標準的適用性。但在班雅明的翻譯理論之外，我們還能夠從那裏找到適切的理論框架呢？

二、創造性轉變與兩人合譯

薛紹徽每晚參與譯書活動，表面上主導者似乎是其夫婿陳壽彭，而非如林紓在與口譯者合作時霸氣主導。我們可以想像，懂得西洋新潮知識與擁有外語能力的陳壽彭，在外面忙碌一整天後回到家裏，每天夜裏在閨房裏，爲了滿足小十一歲嫩妻求知的慾望，把她不懂的語言英文所記載的聞所未聞新奇知識，以中文訴說出來。丈夫抱著開拓太太眼界的念頭，但妻子不見得完全如實筆錄下來。陳壽彭在〈亡妻薛恭人傳略〉說：「自視所作古文字弗若恭人遠甚」(76)。翻譯與夫妻關係的糾葛，彼此知識背景的差異，都使得兩造合作翻譯超越單純的口譯者與筆錄者關係。林紓與口譯者之間的互動，可能是一番不同的景象。一邊是國學底子深厚的桐城派古文大家，且在一八九九年譯出的第一本書《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後聲名大噪，另一邊的口譯者，「都是接受新式教育或出洋留學，大抵精通西文，承擔從挑選翻譯的材料到小說內容翻譯的工作」(劉雪真 123)，但許多是他的學生、侄輩、友人或同事。根據劉雪真綜合若干資料整理出一份圖表，與林紓合作過的口譯者共有二十位(122-23)。林紓與口譯者合作的模式，據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再指陳的，林不但喜歡刪節、修改原作，有時還會插嘴，加入自己的意思或評語。除了這種似乎較爲霸道的主導行爲外，林紓與第一位合作的口譯者王壽昌，有相當契合的演出。根據劉雪真的描述，「在翻譯的過程中，口譯者王壽昌先讀原文一段，再翻成中文口述，並不時爲原文添加修飾與解說；而林紓爲了譯好作品也必定認真領會原作的精神，並不時與口譯者交流、溝通和確認」(124)。劉還舉兩人譯到最傷心處，會「相對而哭，哭聲之大，聲澈戶外」(124)，以說明合譯時兩人之專注與投入。

當翻譯是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不論是像薛紹徽與陳壽彭夫婦間的鸞鴦情深，或類似林紓與口譯者在譯文上的較勁、溝通或共鳴，顯然都已超越班雅明所描述的譯者職責範圍。德勒茲與瓜達里在《千高臺》(*A Thousand Plateaus*)的導言兼第一章，開宗明義即提到兩人繼續合作寫書：「我們兩人合寫《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因爲我們每個都是好幾個，已經是不小的一羣了。在此我們用到一切可接觸到的，最近與最遠的」(3)。德勒茲與瓜達里一共合作寫了四本書，⁵ 在第一本書《反伊底

5. 除了這兩本之外，還有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卡夫卡：邁向少數文學》及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何

帕斯》於一九七二年出版後，繼續合作寫第三本《千高臺》（一九八〇出版），一開始就提到拋棄統一主體與統一客體概念，稱合作寫書的兩人有如在沒有上層主導下的一羣人，而且所處理的並非脈絡分明且統整為一的根類(root)知識，而是多重性(multiplicity)未被納入單一體系的塊莖(rhizome)類。在這篇導言裏，德勒茲與瓜達里刻意突顯在統一主體與客體並現前的多重性，也就是所謂的「 $n - 1$ 的面向」(6)。我們探討薛紹徽與陳壽彭，或林紓與口譯者合作翻譯，或許可從德勒茲與瓜達里合作寫書找到一些可供參考之處。不是視他們為兩個理性、統一、具行動力的主體(rational, unified, efficacious subject)與人合作譯書，而是從這個大家習以為常的主體觀念，拉回到之前沒有一個能說出「我」的多重性，且萬物也不是由一個個完整客體景然有序排列而成，而是德勒茲與瓜達里所說的「部份物體」(part object)雜然並陳，以非我們所熟悉的風貌呈現。以人為例，部份物體不是整個身體的全貌，只是一小部份，如鼻孔、一顆門牙或一根指甲等。

德勒茲與瓜達里在這篇導言裏的論述，有兩點可供深思。首先是從塊莖所代表的平整而無上層主導的概念，推演到一致平面(plane of consistency)及他們兩人合寫作品在書籍的平面空間印出。其次是從塊莖所含的結盟(alliance)概念，對照樹根所代表的親屬關係(filiation)，申論暗合結盟概念的黃蜂與蘭花(wasp and orchid)，巧妙合作達成繁衍功能。黃蜂與蘭花不屬同一物種，甚至一屬動物，一屬植物，但聯手仍可達成常見諸同一物種共同完成的功能。雖然所謂的聯手如果從分子的角度看其實是誤解，但我們仍期待在兩人合作寫書的脈絡下，找到兩人合作譯書的關鍵視野。

先從第一點談起。兩人合作寫書，雖然強調多重性，每個人好像由好幾個個體所組成，兩個人合在一起，有如一羣不小且上頭沒人統領的羣眾。在《千高臺》的導言裏，德勒茲與瓜達里定義塊莖或多重性時，提到這兩者「都不容被符碼定型(overcoded)，其縱橫的線路之上，也就是那些眾多數量的線之上，沒安插補充層面的餘地」。因為如此，「所有的多重性都在平面上，充滿或占據所有層面：因此，我們要談多重性的一致平面，即使此『平面』上的連結數量增加而使其層面跟著增多」(9)。他們合寫書籍的特色，是「多重性由外面界定：由抽象線、逃逸線(line of flight)

或擺脫疆域(deterritorialization)定義，它們根據這些改變性質，並與其它多重性連接」(9)。接著他們指出，德國作家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寫作風格，即為把一切都攤平放在對外開放的一致平面上，總是與外面保持關係。無論是德勒茲與瓜達里合作寫書，或他們兩人推崇的克萊斯特寫作風格，特色都在於多重性與外面的聯結。外面元素未被完全阻絕，而是持續流入，導致擺脫疆域而在重納疆域(reterritorialization)時改變性質。多重性與外面的聯結，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擺脫疆域與重納疆域，蘊含著翻譯的機制。從擺脫疆域而使原文裂解為語言碎片，呈現多重性，到重納疆域時完全轉換為譯文。在這過程中，與外面的聯結成為界定多重性的關鍵，也翻轉多重性的狀態並改變其性質。

值得注意的，是德勒茲與瓜達里書中提到，與外面的聯結導致擺脫疆域，而在重納疆域時改變性質。這些描述喚起班雅明在〈譯者之天職〉裏所說的，翻譯不在語言森林的中央，而是在外面面向高聳的樹林。不同的，是班雅明談的是一位譯者，而德勒茲與瓜達里此處指的則為一致平面上的多重性，一批沒有一個能說出「我」的單一性(singularities)。這裏可以初步推論：從口譯者接觸原文篇章到筆錄者定稿，這整個過程可視為翻譯。單是這種推論意義或許不大，理由很簡單，即使沒有深奧的理論，也可輕易得出這個結論。不過，上列推論的重點在於與外面的聯結，而且在德勒茲與瓜達里的觀點裏，兩人合作等於一羣個體參與，且所看的與所用的不是物體的完整樣貌，只是部份物體。這種觀點明顯排除合作雙方有無互相影響或如何影響這類建立在完整主體與客體的問題，甚至連班雅明所提，譯者站在語言森林外面，遙望著樹林中央之類的觀點都會遭到質疑。因此，單只把口譯者與筆錄者整個合作過程視為翻譯，並沒有根本解決兩人合作譯書的問題，反而把其中潛藏的可能性掩蓋住。如果借用塊莖的結盟概念探索，或可找到更寬廣的翻譯視野，雖然我們未必能期待從林紓與口譯者或薛紹徽與陳壽彭夫婦間的合作推出類似的論點。

與塊莖的結盟概念相關連的黃蜂與蘭花，如果視為兩個獨立的個體，彼此毫無血緣甚至不屬同一物種，卻能藉著相互模仿而巧妙完成繁殖機能，對於探討合作翻譯的問題可能會有啟發。但放在多重性、部份物體、分子觀點這類把主體與客體推到形成前的單一性，黃蜂與蘭花會被視為兩個絕對不相干之存在，「無平行進化關係」(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10)。即使如此，黃蜂與蘭花如何相互形成塊莖，仍是一個

值得重視的議題。在《千高臺》裏，德勒茲與瓜達里對塊莖有如下的描述：

塊莖沒有開始或結束；總是在中間，在物之間、存在之間、間奏曲。
樹是親族關係，但塊莖是結盟關係，獨一無二方式的結盟。樹根設
定的是描述實況的 Be 動詞，但塊莖的結構是連接詞，「和……和……
和……」。這個連接詞挾帶著足夠力量撼動且連根拔起 Be 動詞。(25)

這段引言含括許多要義，我們且先關注塊莖涉及的結盟概念。任何兩種看似不相干的東西，都可能形成塊莖。黃蜂與蘭花即其一，德勒茲與瓜達里也舉書籍與世界，稱兩者是塊莖關係，非傳統認定的基於相似或逼真。黃蜂與蘭花這兩個異類東西如何形成塊莖呢？「蘭花藉描繪黃蜂而形成的影象把疆域打破了；但黃蜂在那個影象上重納疆域。不過，黃蜂被打破疆域了，流變為蘭花生殖體系的一支。但它藉著傳送蘭花的花粉，把蘭花重納疆域」(10)。形成塊莖的黃蜂與蘭花，可以在蘭花因模仿黃蜂而擺脫疆域之後，黃蜂接續從導致蘭花擺脫疆域的影象上重納疆域。誤把蘭花模仿的影像當作自己，雖然使黃蜂因撲身而上而重納疆域，但也因傳送花粉成為蘭花繁殖系統的一支，黃蜂因而被擺脫疆域了。蘭花卻因黃蜂傳送花粉而繁衍，得以重納疆域。上述解讀的主要弊病，不僅把蘭花與黃蜂當作完整的組織，在互相模仿中也有擬人化的傾向。德勒茲與瓜達里認為，從兩個平行的地層(strata)看，上述解讀固然沒錯，但雙方其實沒有相互模仿，可以說毫無干係，「只是在共同塊莖構成的逃逸線上兩個相異系列爆開了」，以致無法再表意了(10)。儘管形成塊莖的兩者不會相互模仿，但可以從毫無關係的對方擷取符碼，產生流變(becoming)。他們引用修敏(Remy Chauvin)的觀念並申論，稱兩者無平行進化關係，彼此絕無關聯，但可以從結為塊莖的一方帶走生命資訊，啟動創造性的轉變：

在某些情境下，病毒可與細菌細胞聯結，並以某一複雜物種的細胞基因流傳；它還可遁走，進入完全不同物種的細胞，無可避免地從第一宿主帶走「基因資訊」……進化模式已不再遵循從最簡單到差異最大的樹形世代相傳模式，而是立即在不同物種裏運作，從一種已很複雜的物種跳到另一種。(10)

形成塊莖的兩個物體，不論是黃蜂與蘭花，病毒與細菌，或任何兩個毫無關聯

的存在，都可以從對方擷取符碼，帶走基因資訊，啟動創造性的轉變。正如引言所示，德勒茲與瓜達里的關切焦點，已非單一物種由單細胞演變到複雜結構的進化模式，而是不同物種間的跳接、轉變、進化模式。在《千高臺》裏，創造性遺傳理論已轉為塊莖概念。書一開始，塊莖即被視為具實驗性，因而是地圖(map，與實體的實驗性接觸)，而非描繪(tracing，可達逼真效果，但失去實驗性)，是開放的多重性(即之前所說的多重性與外面的聯結)。他們也認為，一切生命都是塊莖模式的改變，沒穩定、固定的界限，來去都出自中間，而非開始與結束。無限數量的連接詞「和」，可把標榜描述實況的框架沖垮，帶來實驗與創新的可能。在《千高臺》，德勒茲與瓜達里認為，生命力天生具有創造性與社會性，因而不在于物種、基因與有機體等這類講求本質論框架裏討論遺傳問題，因為他們深刻體認，具影響與被影響能力的情動力(affect)，才是創造力之所在。

從德勒茲與瓜達里合作寫書，我們看到兩者所形成的塊莖。也從黃蜂與蘭花這兩個分屬不同物種的東西，發現任何兩者都可能結為塊莖。進而從物種的越界聯結，脫離原先認為進化只限於單一物種之內的觀點。當生命以越界方式展現豐沛的創造力，當生命的來去都出自中間，而非著眼於開始與結束，當多重性與其它多重性的聯結可以像連接詞「和」一樣無限延伸，班雅明翻譯理論講究的直譯、回歸原文、保留語言的異質性等，就失去其適用性，理由其實很明顯。我們在早先提到，德勒茲與瓜達里的論點，不論是擺脫疆域與重納疆域，或由塊莖推衍出來的其它種種論點，其實都蘊含翻譯的關鍵質素。當班雅明的翻譯理論不適用於兩人合譯裏的執筆角色，我們把關注焦點轉到德勒茲與瓜達里，希望從他們合作寫書找到解讀合作翻譯的適當視野。接著我要從《千高臺》第十一章〈疊韻〉(“Of the Refrain”)，探索合譯時兩人各自扮演甚麼角色？各自的角色又如何結合而為塊莖？我也要閱讀他們合寫的《何謂哲學？》(What Is Philosophy?)第七章〈知感、情動力與概念〉(“Percept, Affect, and Concept”)，從意念及表達材料在無法感知的狀態下相互交融，藉此剖析情動力與翻譯的可能關係。

〈疊韻〉這一章提到轉譯(transduction)與轉碼(transcoding)，不論是前者或後者，指的都是越界後兩個中域(milieu)的關係。《千高臺》雖然以高臺(plateau)為架構全書的單元，但渾沌卻是背後的核心思維。在渾沌狀態下，無限快的速度使得一切物體

都失去形狀與時空元素。從渾沌迸現的中域，是「空間-時間的組合，其構成的組件會定期重複」，因為每個中域都受符碼規範，而「符碼的特質是定期重複」(313)。中域由於是從渾沌產生，是混亂中出現的脆弱秩序，隨時有被衝毀而回歸渾沌的可能。韻律(rhythm)是中域為因應此種威脅而產生，與渾沌一樣都位處兩者之間。渾沌在位處兩者之間時，就成為韻律。源自定期重複的中域，唯一功用是產生差異，每當差異產生就會出現轉碼移動，越界跨進另一個中域，這時兩個中域之間會有韻律出現(314)。在越界頻頻之中，轉碼或轉譯界定兩個中域之間的關係，「一個中域成為另一個中域之基礎的樣子(manner)」，或「一個在另一個上面，在裏面消失或形成」(313)。一個中域以另一個中域為基礎，轉碼或轉譯就在決定兩者依存關係的越界移動中產生。要特別指出的，是這裏所提的轉譯或轉碼，不同於翻譯之處，在於無需譯者在原文與譯文之間權衡該如何轉換，而是隨著差異產生後必然要越界而來的符碼變換。轉譯或轉碼發生在越界之中，有助於說明物體在越界中自渾沌吸取新動能、新元素、新符碼，啟動創造性的轉變。如果一定要具體指出，兩個相疊的中域哪一個相當於合譯者裏面的哪一個，作為基礎的一個中域可視為口譯者，在渾沌中搭建一個脆弱平臺，在上面的一個中域則為執筆者，從吸取的新符碼尋求創造性的轉變。

《何謂哲學？》至少有兩點仍延續著《千高臺》的特色。其一是以渾沌作為架構全書的核心概念，全書探討科學、哲學與藝術等三個領域如何因應渾沌。在無限快速度下一切物體均消失影蹤的渾沌狀態，速度必須放緩才能辨識。科學把速度放緩後將可辨識的狀態視為常態，放棄渾沌狀態下的無限快速度。哲學有如伸進渾沌裏的濾網，企圖「保留無限快速度，同時得到一致性(consistency)，讓虛擬獲得其特有的一致性」(118)。藝術「不是渾沌，而是建構能產生洞見或感覺(sensation)的渾沌」(204)，希望「創造可回復無限性的有限性」(197)。其二為突顯朋友而非聖人的概念，並從此角度詢問何為哲學？朋友就像木頭裏的卡樺，「木頭的潛能是否潛藏於卡樺；他是木頭的朋友嗎？這個問題重要，因為在哲學裏出現的朋友，不再代表外在人物、例子或實證環境，而代表內在思想、思想本身的可能情境、一個活著的範疇、一種先驗的活過實況(a transcendental lived reality)」(3)。這些有關朋友的陳述，可看出《千高臺》裏兩人合作寫書的幾個要點：多重性而上頭沒有統領機制、結盟而非血緣關係、無限數量的連接詞。友情的基本要素是，「兩個朋友有如要求者(claimant)

與競爭者」(4)。地位相當的兩個人或多個人結為朋友，彼此在愛情、遊戲、法庭、政治、思想上互相競爭，或要求給予奧援。探討合作翻譯，可從朋友或情人所隱含的競爭者與求助者關係，獲得甚麼啟發？我們或可從林紓與薛紹徽各自的合作譯書經驗找到一些線索。

從《何謂哲學？》的兩大特色，尤其是前一點，我們來閱讀該書第七章〈知感、情動力與概念〉，檢視以藝術如何回應渾沌為主軸的這一章，在將有限性推向無限性時，意念及材料如何相互交融，並藉此探討情動力與翻譯的可能關聯。

知感有別於洋溢著個人色彩的感知(perception)，獨立於有過這些感知經驗的個體。情動力也異於知覺(feelings)或動情(affections)，脫離經歷過這些情緒的個人(164)。為甚麼要刻意強調這兩組的差異呢？藝術品所表達的微笑、憤怒或悲傷，在創作者以材料表達出來後，就脫離創作者個人的情緒反應，從此靠著這些材料保存知感及情動力。藝術品因而被德勒茲與瓜達里界定為「一組感覺，亦即知感與情動力的混合」(164)。但創作者的感知、感覺或動情，如何透過材料轉為藝術品長久保存的「一組感覺」或「知感與情動力的混合」呢？德勒茲與瓜達里提出「無法辨識區」(zone of indiscernibility)概念，描述創作過程中一組感覺在材料中成形，或材料溶入感覺裏，但都是在美學創作平面上(196)。

無法辨識區指的是瀕臨形成自然差異之前的狀態，在創作過程中必須歷經此階段，因而給予創作者發現情動力的機會。在創作過程中，流變居關鍵位置。「流變是極為鄰近的兩個不相似感覺被合在一起，或相反地，是燈光可及的距離，兩個同時被閃現的燈光捕捉上鏡」(173)。引言中雖然提到流變時兩個不相似的感覺被合在一起，我們可從創作時意念與材料同時被閃光捕捉到，來解讀無法辨識區裏一組感覺在材料中成形，或材料溶入感覺裏。當意念與材料被合在一起時，在閃現的靈感中材料裏某些質素被意念所擷取，因而啟動創造性的轉變，感知頓時蛻變為超越人意念的知感，動情則轉變為情動力。書中還舉英國女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小說《達洛威夫人》(Mrs. Dalloway)為例，稱是達洛威夫人感知小鎮，但她就因像「刀畫過一切」般穿過小鎮，自己變得無法辨識，「情動力正是人的非人流變，正如包括小鎮在內的知感，是自然的無人風景」(169；原文著重)。

翻譯與情動力可以有甚麼關聯呢？換句話說，合譯裏的執筆者，在把從聽口述

所得的意念轉為文學的材料文字與語法時，能否達意念與材料融合，因而在接續的無法辨識區產生類似達洛威夫人經歷的非人流變？答案顯然是肯定的。林紓與第一位合作的口譯者王壽昌，在合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時，兩人譯到最傷心處，會「相對而哭，哭聲之大，聲澈戶外」（劉雪真 124）。林紓在聆聽王壽昌口譯時，顯然已融入整個故事情境，因而在找尋適當材料表達時，很自然地達到意念與材料融合。更加重要的，透過材料表達意念，不僅讓下筆者達到譯者的層次，也在過程中讓筆錄者驚鴻一瞥地領會到情動力。不過，如果前引班雅明論點否定筆錄者的譯者角色，此處何以認定其達到譯者的層次？答案在於班雅明的翻譯觀過於強調翻譯與不同語言之間的異質性，而口譯者與筆錄者用的都是同一種語言，沒有異質性待克服的問題。但德勒茲與瓜達里認為任何兩者都可形成塊莖，其中一方可從另一方擷取關鍵資訊而啟動創造性轉換，這種跨領域的流變他們稱為轉譯或轉碼。如果用在合譯的筆錄者，其實已可視為翻譯。

三、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塊莖關係

德勒茲與瓜達里合作寫書，在《千高原》裏突顯塊莖的概念，在《何謂哲學？》則強調朋友之間的諸種關係。林紓與薛紹徽各自與人合作譯書，在研究合譯的問題時，能從德勒茲與瓜達里提出的這些模式及隱含的一些概念，得到甚麼啟發呢？在這一節裏，我要應用前一節的理論論述，解讀林紓與薛紹徽的合作譯書活動。林紓與薛紹徽參與的譯事活動，在引出上述理論思辨後，如再經由這些理論加以詮釋，與其說是驗證理論的適用性，不如說是在理論與實踐所形成的新塊莖關係中，找尋創造性轉變的可能性。

塊莖所傳達的兩個可能沒甚麼關聯的生命或人的組合，從林紓的合作經驗來說，表面上大部份似乎並非沒甚麼關聯。第一位與他合作的人，是他的好友兼同鄉王壽昌，兩人於一八九七年前後合作翻譯而於一八九九年一月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可說一炮而紅，叫好又叫座。接下來與他合譯六十餘部小說的陳家麟是林紓弟子，合譯包括《黑奴籲天錄》在內四十餘部小說的魏易是林紓的同事。嚴復的弟子曾宗輦、嚴復的長子嚴璩及嚴復的侄子嚴培南，都與林紓合作過。除同鄉情誼外

可能並無較親近關係的人，僅有合譯過三部小說的廖琇琨及一齣戲劇的葉于源。合作過的人以林紓的弟子最多，在二十人中佔九人，這大致可以說明他何以能在合譯過程中強勢主導。但如果從合作雙方的思維與知識背景來看，以南轅北轍形容或嫌誇張了些，但雖不中亦不遠。這些口譯者都接受新式教育或出洋留學，大都精通西文，這都不是長期浸淫於中國傳統思想、不通外文的林紓所能企及。雙方在思想與視野的鴻溝，可從以下兩段引言窺其大概。根據林紓最重要合作者魏易的女兒魏惟儀的說法，林紓「不太瞭解譯書必須忠於原文，不可隨意竄改，往往要把自己的意思加進去，自然不免與父親發生爭執」(21)。秦瘦鷗也曾轉述毛文鐘與林紓的合作經驗：「他卻又十分固執，中文稿一經寫定，口譯的人如發現了甚麼不妥之處，要求他修改，就難如登天，縱然以不符合原書本意為理由，向他力爭，他老先生的倔脾氣一發，往往也會置之不理」(175)。

薛紹徽與陳壽彭這對夫婦的翻譯組合，表面上雖然不會如塊莖構成物般可以毫無關連，但如進一步檢視，可能並非原先想像的毫無歧見。不論是從陳壽彭的描述或其他文獻，薛紹徽都是一個受良好教育、謹守女性本份、敬夫如天的傳統女性。陳壽彭在〈亡妻薛恭人傳略〉中曾提到她「勤慎安貧」、「言論必有根據」。陳宏在〈淺論薛紹徽詩詞的藝術風格〉文中，誇她「出身書香門第，接受的是正統的儒禮的薰陶。她始終恪守閨範，自覺地遵守自己的社會定位」(62)。在夫婦關係方面，陳宏提到她除「對愛情的忠貞不渝之外」(66)，在丈夫為前程而離家宦遊，她也表示支持，還在詩詞中叮嚀夫婿不要惦記家庭：「望君慰藉，把內顧、煩憂拋下」(〈轆轤金井·寄繹如上海〉⁶)。我們從文獻看到的，是這個清末閩籍女子溫婉、顧家、順從丈夫的一面。但在與夫合作翻譯上，兩人是否仍然如此契合呢？據劉靜爽在〈晚清兩性女學觀比較—以梁啟超、薛紹徽為例〉表示，薛紹徽在她寫的〈《外國列女傳》序〉說，她與丈夫陳壽彭在翻譯《外國列女傳》時，對如何評價西方婦女，兩人態度有極大差異，「陳堅持以西方標準描述西方婦女，薛則主張參考中國標準介紹西方事迹，表面看來似乎是開放的西式丈夫和保守的中式妻子之間的矛盾」(劉靜爽 11)。從薛紹徽身體力行傳統中國婦女閨範，她對評價西方女子所持的態度，其實不讓人訝異。隱藏在溫婉、順從外表之下的，是一顆固執、好勝的心。據陳壽彭在〈亡妻

6. 「繹如」為陳壽彭之別號。

薛恭人傳略》所說：「自視所作古文字弗若恭人遠甚，乃求舊籍讀之，期有補我不足，而恭人亦猛力攻苦，弗少讓，余剛得尺，恭人且越尋丈矣」（標點由本人所加 76）。薛紹徽個性之強由此可見一斑。如果薛堅持對西方女子的評價不能採西方標準，也要參考中國標準；如果她自知中國古文能力勝過夫婿甚多，竟還想不斷擴大領先的優勢，那她對西文翻譯中文，又會堅持甚麼呢？

塊莖組合與多重性所揭示的反對上層主導，反對統一機制，在林紓與薛紹徽的譯書過程中都出現端倪。根據錢鍾書所描述的林紓與口譯者合作模式，林不但喜歡刪節、修改原作，有時還會插嘴，加入自己的意思或評語。從這些行為來看，林紓有尊重口譯者所欲傳達的原文意義嗎？答案顯然不是全然肯定，即使不能完全否定。薛紹徽在與夫婿陳壽彭合作時，對他口頭傳達的意義可能較順服，但在價值判斷方面可能堅持己見，對語言的表達、風格與書籍的文體，可能也會有強烈的見解。對目錄的改動，就更加嚴重了。有關林紓與薛紹徽在參與譯書時的這些表現，都吻合塊莖或多重性的定義，也就是「都不容被符碼定型」，也就是不讓權威觀點從上面宰制。口譯者說出的內容，如果完全接受，照單全收，其實就是讓原本在一致平面上的多重聲音，轉為由其中一個上升到主導地位的聲音發號施令。原本在單一平面上的多重性，出現上頭有一個指揮統合的機制。這樣到底有甚麼缺點？製圖與描繪之差異生動點出，主控機制之存在將徹底抹殺創意的可能。轉換為合作翻譯的情境，如果完全照口譯者口述的意義記錄下來，等於在白紙上順著鋪在底下的圖所浮現的痕跡描繪。這麼做固然較為逼真寫實，但也失去在過程中實驗創新的機會。林紓與薛紹徽對待口譯者所傳達的內容，比較像製圖，多了一些眼、手、腦之間的協調，也就是給自己的學識、背景與文才多一點發揮的機會。即使講究思慮縝密、推理嚴謹的概念，德勒茲與瓜達里都認為，「任何仍有疑慮的與實踐性的架構，都比緊盯著概念描繪(tracing concepts)來得好」(1987:24)。寧可抱著可能有錯的實踐性架構，也不願密切遵循像概念這麼嚴謹的體系。以此視野檢視林紓與薛紹徽，應該不難瞭解，他們雖然不被原文所羈，但譯作仍廣受歡迎。以林紓的譯著為例，即使批評他刪改原文、不尊重口譯者的錢鍾書，都誇獎他譯的書有些比原著更吸引人，並說自己寧可讀林的譯著，也不樂意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普受歡迎的小說家哈葛德(Henry W. Haggard)的原著。

林紓與薛紹徽各自與口譯者合作，一方不懂原文語言，另一方的口譯可能沒達到讀者所期盼的語言水準或整體文本效果。從口譯者接觸原文篇章到筆錄者定稿，如果把這整個過程視為翻譯，其中涉及怎樣的機轉？如果像德勒茲與瓜達里認為兩人合作寫書等於一羣不少的個體參與，且所看的與所用的不是物體的完整樣貌，只是「部份物體」，翻譯在這種視野下會以甚麼方式呈現呢？與塊莖的結盟概念相關連的黃蜂與蘭花，表面上可以跨越物種合作完成繁衍，但若從更深一層看，兩者其實毫不相干，「無平行進化關係」(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10)，卻能透過結盟吸取對方符碼，如病毒與細菌從對方擷取符碼，帶走基因資訊，啟啟動創造性的轉變。藝術把有限性推向無限性，以回應渾沌的挑戰。從其中涉及的疆域到擺脫疆域，或流變中兩個無關聯乃至無類似性的物體聯在一起，這一切都在訴說著一個不是我們所習知的翻譯，也不是班雅明所說的翻譯，轉譯或轉碼比較能表達這種不是由一個譯者權衡兩種語言的異質性而作的語碼轉換。林紓與薛紹徽參與的翻譯工作，隱隱然把德勒茲與瓜達里合作寫書所塑造的塊莖及朋友模式帶過來，讓人不禁詢問，在他們的翻譯中可嗅出哪些創造性轉變的跡象？

朋友具有平輩間協助者與競爭者的雙重角色，不同於聖人與眾人之間潛在的上下位階。平輩的朋友關係宛如內在於知識體系的一連串對等連接詞「和」，在競爭與協助的一連串環節中，可能影響甚至改變論述的內容。同屬平輩的夫妻，也可納入朋友關係內，尤其是陳壽彭與薛紹徽這對夫婦，以檢視這類關係在聆聽與筆錄之間的可能影響。在夫婦諸種關係中，合作譯書應屬較特殊的一種，尤其每晚閨房中的譯書活動，竟成了夫妻上牀就寢前的序曲，再加上彼此間的協助者與競爭者角色，更加可能在翻譯過程中發生影響。陳壽彭與薛紹徽這對夫妻，一方是觀念西式、思想新潮的丈夫，不僅在夫妻合譯中擔任口譯，也曾被滿清政府派往歐洲擔任時稱舌人的口譯；另一方是不通外文但中文極佳且擅於吟詩作詞的妻子，一向奉中國為天朝、深受其傳統價值影響、卻又感受到西方聲勢銳不可擋。夫妻相差十一歲，雖然還不到老夫少妻的懸殊歲數，但年長的丈夫可能刻意討好嬌妻，且如稍前所引，知道妻子的中文造詣遠勝自己，但對西方文物所知有限。由於翻譯《八十日環遊記》部份是基於滿足妻子對「吳越舟車」、「汽輪電燈」的求知慾，因而揀選這本他認為較為淺近的小說。除了幫助者角色外，彼此也存在競爭關係。如前所引，陳壽彭提

到「自視所作古文字弗若恭人遠甚，乃求舊籍讀之，期有補我不足，而恭人亦猛力攻苦，弗少讓，余剛得尺，恭人且越尋丈矣」（76；標點由本人添加）。如果再加上譯《外國列女傳》時對如何評斷西方女性的爭議，這對夫妻的競爭關係其實相當明顯。當這幾種關係與翻譯夾雜在一起，更加能夠期待翻譯帶來創造性轉變的可能性。

德勒茲與瓜達里在《千高原》裏突顯塊莖的概念，談到一連串對等連接詞「和」可以顛覆 *Be* 動詞所陳述的事實。《何謂哲學？》則強調朋友之間的諸種平輩關係，同樣談到一連串對等連接詞「和」可能從銜接點對內容物的影響而產生巨大變化。無限數量的連接詞「和」，可把標榜描述實況的框架沖垮，帶來實驗與創新的可能。以烹煮為例，每一道菜都由幾種食材搭配烹飪而成，如無限制加入新材料，有可能煮出意料之外的美味佳餚，當然也可能煮出無人願吃的爛菜。回到陳壽彭與薛紹徽夫妻合譯，當翻譯在恩愛夫妻之間把協助者與競爭者的雙重角色帶了進來，原本有如在渾沌中搭起翻譯基礎的口譯者，其傳達的內容可能遭到不同程度的實驗、修改、替換。

四、結論

在《千高原》裏，德勒茲與瓜達里誇獎英美文學展現塊莖的走向，「它們知道如何遊走於事物之間，建立『和』的邏輯，推翻存有論，剷掉基礎，廢除結束與開始」（25）。早先，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對話》(*Dialogues*)法文本，⁷ 有一篇章名為〈論英美文學的優越性〉（“On the Superiority of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文長約四十頁，我們不妨顛倒時間的先後，把它當作對《千高原》裏有關英美文學簡短敘述的進一步闡述。《對話》是德勒茲接受克蕾兒·巴內特(Claire Parnet)訪問後兩人合寫的書。這章一開始就從英國小說家勞倫斯(D. H. Lawrence)的角度談「離開、逃逸」，並引用他的話，稱文學的最高目標是「離開、離開、逃逸……穿越地平線，踏進另一種生命」（轉引自 Deleuze and Parnet 36）。勞倫斯並非英美文學裏打破穩定、倡導逃逸的孤例。文章緊接著舉出許多有類似想法與作法的英美文學作家：

7. 我引用的書為一九八七年的英文本，文章中標出法文版的出版日期，是為了追蹤相關書籍出版的先後年度。

英美文學持續出現這些打破穩定的事例，這些創造他們的逃逸線，並透過逃逸線來創造的人物。哈代(Thomas Hardy)、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吳爾芙(Virginia Woolf)、伍爾夫(Thomas Wolfe)、勞倫斯、費茲爵羅(F. Scott Fitzgerald)、米勒(Henry Miller)、凱魯艾克(Jack Kerouac)。對他們，一切都是離別、流變、過境、跳越、魔鬼、與外在的關係。他們創造一個新地球；但或許地球的移動就是擺脫疆域本身。(36-37)

文章中對許多英美文學作家的讚譽，所用之詞彙頗為類似我們在《千高臺》讀到的有關塊莖之描述，強調生命以越界方式展現豐沛的創造力，反覆陳述生命的來去都出自中間，而非著眼於開始與結束。作者認為「邏輯就像幹道，不是在開始，也沒結束，不能停」(56)。這一章也觸及無限的對等連接詞「和」對 Be 動詞所含括事實面向的顛覆力，提及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對關係外在於條件的論點，並稱「只有英國人與美國人放任連接詞與關係自由發展，這是因為他們對邏輯的態度非常特殊」(56)。從邏輯思維解釋英美人士何以不重視開始與結束，而將目光放在中間，何以會打破疆域創造逃逸線？有關關係外在於條件的論點，姑以約翰比保羅高為例說明，這種高矮關係並不存在於各自的身高條件裏，而是從比較中得出這種關係。從這種邏輯可推知外在很重要，因此，要與外在世界溝通，與他人溝通，這也因而成為他們文學的特色。從英美人士對邏輯的特殊態度，解釋英美文學的塊莖走向，說服力增加了許多。不過，這種推理的延伸不應僅止於此。本文開始不久，即把英美兩國的翻譯傳統界定為意譯，雖然內部仍不時有主張直譯的聲音傳出，但整體而言還是明顯有別於德國的直譯傳統。英美兩國的意譯傳統，似乎也可從英美文學的塊莖走向找到一些關聯。

班雅明翻譯理論講究直譯，主張回歸原文，讓原文的語言異質性在譯文裏顯現出來。這些論點如果放在英美文學裏，也就是說放在發展出這種文學傳統的社會裏，扞格之處恐怕會很明顯。先談班雅明對源頭及原文的強調。對源頭的重視，使得班雅明在談差異與重複時，都強調不論是第幾次都是第二次，因為都是緊盯著源頭，中間不論發生過多少次都不算。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文〉(“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裏，提到歷史天使臉孔朝著過去，雙腳之前廢墟堆滿地，別人會認為是

一連串事件，但他只當作一件(Sect. IX)。同一篇文章還提到，別人採行的方式是「加起來」，他則主張「建構式原則」(Sect. XVII)，在今古相遇時，歷史被現在所充滿(Sect. XIV)，因而在思想含括的「流動—停頓」中突然停頓下來，領悟到被消音的歷史(Sect. XVII)。這篇文章強調源頭，否定中間一件又一件相加累積起來的意義。班雅明在翻譯上主張只有原文能夠翻譯，譯文無法翻譯。他主張直譯的最重要理由，是藉此體認語言親屬關係的存在，讓充滿訊息與意義的語言得以在翻譯中清除腐朽而升級為純粹語言。德勒茲所描述的英美文學，否定開始與結束，而將重心放在中間，強調無限數量的「和」累積下來，可產生沖垮 Be 動詞所陳述事實的效用，更重要的是跨界所產生的創造性轉變。綜合雙方論點的明顯歧異，英美兩國的翻譯主流走向意譯，其實是有脈絡可循。不過，在多元的社會，武斷地認為只有一種風潮而否定其它可能，是危險的推論。以英國來說，在浪漫主義時期，受到早期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直譯的呼聲與作法是當時的主流。此外，德勒茲文章中所提的英美作家，清一色是小說家，而且是比較晚近的小說家，以此取樣代表英美文學，可能失諸片面。

儘管有一些保留，從德勒茲對英美文學的塊莖走向發出的讚美之詞，我們可作幾點演繹。首先，不能率爾認定直譯必然優於意譯，直譯有其無法否定的重要意義，但意譯開啓的創造可能性也要被肯定，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排擠呵斥意譯作品。其次，林紓與薛紹徽所處的特殊時空環境，以及他們因不懂外文而無法閱讀原文，都使他們在翻譯時採取意譯策略，也在不自覺之中以適合英美小說傳統的翻譯模式翻譯。薛紹徽翻譯的雖然是法國小說家凡爾納的英譯本小說，但法國的翻譯傳統也是意譯。回到林紓與薛紹徽各自參與的合譯，兩人檔的翻譯產生有如塊莖的關係，不讓懂得原文的口譯者取得獨攬全局的發號施令位置，而在有如跨界的互動中找到創造性轉變的契機。不過，我們也無需過度美化他們的翻譯成果或作法。正如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所說，林紓四十五歲開始翻譯，接近三十年的翻譯生涯，可以民國二年譯完《離恨天》為分水嶺，前期十之七八都很醒目，但在後期「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勁頭鬆懈」(95)。薛紹徽是清末著名女詩人，女詩人加上不懂外交的譯者身份，讓人充滿好奇，如果我們接受班雅明所說詩人是最好譯者的論點。

本篇論文從清末民初的西洋典籍中譯談起，以林紓與薛紹徽不同於傳統方式的翻譯為經，並以包括林紓與魯迅在內的若干意譯與直譯之爭為緯，引出班雅明與德

勒茲／瓜達里有關翻譯的不同論點。從班雅明的角度來說，相較於譯者在原文與譯文之間突然領悟如何克服語言間的異質性，再將領悟轉為譯文，林紓與薛紹徽筆錄、整理、美化文字，可說絲毫沾不上翻譯的邊。但若從德勒茲與瓜達里的觀點檢視，任何兩者都可形成的塊莖關係，打破樹根類親屬關係所隱含的疆域概念，連帶在跨越疆域時，其中一方從另一方擷取關鍵資訊，因而啟動創造性轉換。強調譯者在原文與譯文間權衡異質性如何轉換的翻譯，在德勒茲與瓜達里筆下成為轉譯或轉碼，是跨越領域時自然的流變，兩者之間差異頗大。轉譯或轉碼之重要性，在於把翻譯從語言與文學的層面，推向文化研究與生物科技的面向。這種轉變或關切範圍的擴大，在生物面向在文學與文化研究裏日益受到重視的今日，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另一層的意義，在於直譯與意譯的紛爭方面。班雅明的翻譯理論重視直譯，直譯在翻譯研究裏一直受到高度重視，評價也遠在意譯之上。但德勒茲與瓜達里的觀點明顯翻轉兩者之間的評價，意譯雖然在忠實呈現原文的全部意義、風格與樣貌方面不如直譯，卻在實驗創新上拔得頭籌。英美文學勇於跨越疆域所展現的創新精神，獲得德勒茲與瓜達里的讚許。相較於直譯，意譯也顯現同樣的創新潛力。本篇論文的主要貢獻，不僅突顯翻譯跨向生物領域的可能性，也從意譯的創新潛力重新評價直譯與意譯之爭，並藉此闡釋英美文學的馴化走向。

- Ashton, R. *The German Idea: Four English Writers and the Reception of German Thought 180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Benjamin, Walter.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s*. Ed. and intro.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1969. 253-64.
-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rans. Harry Zoh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3-63.
- 陳宏。〈淺論薛紹徽詩詞的藝術風格〉。《廣西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2(2010): 62-67。
- 陳鏘、陳瑩與陳荭。〈先妣薛恭人年譜〉。薛紹徽 2010: 78-89。
- 陳壽彭。〈亡妻薛恭人傳略〉。薛紹徽 2010: 76-77。
- Chow, Re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Toward a Rewrit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 卓加真。〈晚清的首部完整翻譯旅遊文學：薛紹徽譯《八十日環遊記》之策略與影響〉。宣讀於書寫中國翻譯史：第二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主辦，21-23 Dec. 2006。
- Compton, Robert William.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s of Lin Shu, 1852-1924."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
- 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and foreword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 Graham Burchell and Hugh Tomlinson. London: Verso, 1994.
- 郭延禮。〈二十世紀第一個二十年近代女性翻譯家羣體的脫穎〉。《中華讀書報》2002年5月8日。第10版。
- 胡適。〈論翻譯：與曾孟樸先生書〉。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 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613-22。
- Lee, Leo Ou-fan.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 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1936)。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6。臺一版。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林薇。《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

劉半農。〈覆王敬軒書〉。鮑晶（編）《劉半農研究資料》。北京：和識產權出版社，2011。
117-28。

劉靜爽。〈晚清兩性女學觀比較：以梁啟超、薛紹徽為例〉。《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32.3
(2008): 9-12。

劉雪真。《依違於古今中外之間：林紓譯／著言情小說的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2。

潘少瑜。《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鵑為中心》。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8。

彭明偉。《五四時期周氏兄弟的翻譯文學研究》。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6。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臺北：書林，1990。81-122。

秦瘦鷗。《小說縱橫談》。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

施蟄存。《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二》。上海：上海書店，1990。

樽本照雄。《林紓冤罪事件簿》。日本大津：清末小說研究會，2008。

Venuti, Lawrence. "American Traditio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 Mona Bak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305-16.

王宏志。〈民元前魯迅的翻譯活動：兼論晚清的意譯風尚〉。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一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168-97。

王宏志。〈魯迅翻譯研究的理念思考〉。《魯迅與「左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46-57。

薛紹徽。《黛韻樓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周作人。〈魯迅的編輯工作〉。止庵（編）《關於魯迅》。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564-65。